
血 债

司徒宗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书馆

1246.7

3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008035

血 债

司徒宗



女子学院 0031425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血 债

司徒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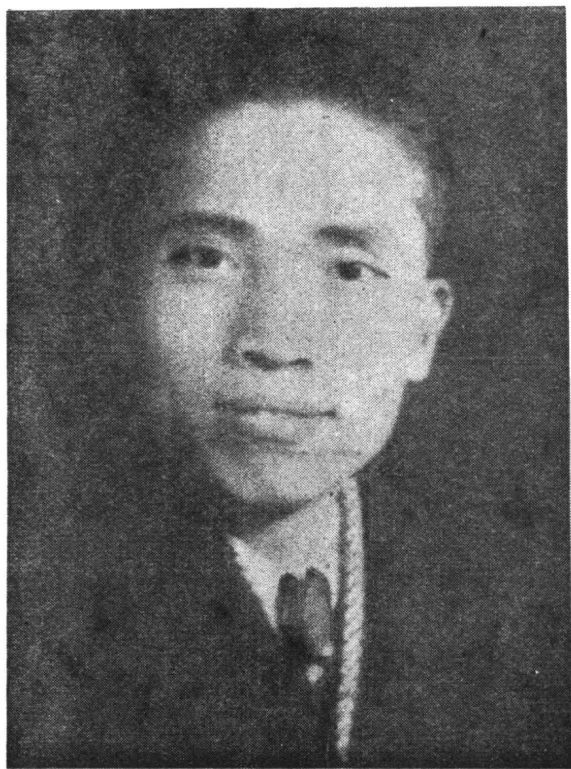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8毫米 1/32 6.625印张 3插页 121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40

书号: 10368·73 定价: 1.10元



作者像

健康，
 这是最常用，但却是
 最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
 健康，
 是
 最难做到的。

作者手迹

缘 起

H-18/01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

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

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朱雯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①。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

^① 1985年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灵魂。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忆司徒宗

(代序)

锡 金

我认识司徒宗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孔彦英。那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叫孔令杰；正象他的哥哥孔另境一样，本名是孔令俊。他是浙江桐乡乌镇人，弟兄俩都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亲弟弟。从他的曾肄业于上海大学附中一事推算起来，他的年龄要比我大些。

一九三八年冬我才认识孔另境，那是由于我从香港回到了“孤岛”的上海，茅公托我把两包编好了的两期《文艺阵地》的稿子交给孔另境，向那时叫做“兄弟图书公司”的生活书店发稿。并由他帮助我找到了王任叔，接上了组织关系。一九三九年春，钱君匋邀我同编《文艺新潮》，并把组稿、编稿的任务都交给了我，由他去发稿、付印、校稿和发行。我那时曾采用过司徒宗的小说稿，可是和作者还未相识，也不知道孔另境有这样一位勤勉而恳挚的弟弟。

到一九四一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突然沦陷，因许广平先生与朱维基在同日午夜被捕，我急走离家，无处存身，只好暂离上海，避居外地。再回上海时表面上

恐怖气氛已经消散，回复了灯红酒绿、弦管沸天的景象，但实际上这片“孤岛”已经成了敌、伪、顽三方面的狐鼠横行之所，我找不到自己的组织了。无奈何，只好耐下心来找党，到解放区去。那时，我虽然也从工作中知道一些横的关系，但当时的组织纪律是不许发生横的联系的，故而也不能冒昧去找。为了消度这愁困的时间，我曾改名为蒋福俦，每天到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的西端比较冷僻而不受人注意的鸿英图书馆去查旧书刊，整治起《楚辞》来，其实，这还有一个目的，想不让邻里把我看成是个无业之人，特别是对门的许家那时成了联保主任，免得他们对我猜疑。所以，我就每天都拎着个提兜到图书馆去“上班”和“下班”了。每天都得走过海格路（现华山路），一次忽然遇见了李平心，他那时还住在这条路上的里弄里，他邀我到家，问我的近况。我谈了情况后他和他夫人胡毓秀（那时她叫蕴华）都认为我不一定会很快就能找到去解放区的关系，我现在这样的做法也决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他夫妇俩给我出个主意，说还不如真的找个职业，他说他有个从前在社联搞哲学的朋友戴介民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现在正在办一所私立建承中学，缺乏国文教员，他俩可以和他说一说，介绍我去教书。我就是在这所当时在白克路（现凤阳路）的一条弄堂的沿街房子里遇见了孔彦英的。

彦英到这个学校大约比我略为晚些。因为我初到建承中学时担任高中三个年级（人数都不多）和初中二年级（人数多些）四个班的国文，我在高中讲的课比较顺利，受到学生

的欢迎，但初中的课程却上不好，和学生总有些杆格难通之处。后来孔彦英来了，便把初中的课程让给他教，他一接手就教得很好，很受学生的欢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曾担任过多年的小学教师，因而比我更懂得少年儿童的知识水平和思想心理。孔彦英包下了初中三个年级的国文课程，人数大约要比我多两三倍，他另外还兼任了学校的教务工作，我则除了包下高中三个年级的国文外，还加开了一门文学概论和一门世界史。因为当时的教课是按钟点计酬的，所以学校为了优待我，总是把每天上下午的钟点都排得满满的，很少有几堂空缺。当时所用的货币是汪伪的“储备券”，不断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所以只好多讲课，上半个学期松些，下半个学期紧些，勉强能维持住生活。学校为了维持住每个学期的先后开支平衡，校长还动员教师在学期初撙节些余款出来，和大家一同囤积些物资和做股票交易。彦英和我由于讲的钟点较多，到后期也还能勉强维持，所以没有参加那种活动。

当时好象已经有了敌伪编印的中小学国文教本，我们让学生备而不用；另外选了当时还在发行的《开明活叶文选》和《北新活叶文选》作为使用教材，有时还用蜡纸刻印些补充教材。其中白话文和文言文的都有，为了满足学生家长的要求，记得我还选讲了《礼记》中的一些章节。此外的文学概论和世界史则没有敌伪教材，我就编了提纲讲。那时我们的国文课除了作文以外，还要求学生每周交一篇“周记”，这“周记”是不批改的，教员通过阅读“周记”发现学生的思

想中出现的问题，轮流找他们来谈话，高中和初中都一样，所以我们和学生个别地交流思想的机会是很多的。学生所记的自己的思想活动中有时能看到有发展，发生了对周围现实生活的感触和进步的革命要求时，我们便向教务主任袁明吾汇报（他后来被调去浙东四明山解放区，由沙重叔接他的任）。经过一个学期或两个学期，有些学生便被输送到解放区去了。因而我知道，在这个学校里是有党的工作的，但我并未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取得横的联系，为了严格遵守纪律，我也不去探讯党的在这个学校的工作具体是怎样做的，以免或者我会被捕，这便保证这个学校的党的工作情况决不会由我泄露给敌人。反正在这个学校工作既然是对党的事业和抗日战争都有利的，我就应该尽心尽力地搞得好些。我是确信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因而我也确信只要我不死掉，终有一日我能和许多旧日的战友在胜利中重新会师，到那时候，我倒是可以用自己的这一段辛劳，来欢迎他们的凯旋了。

我住在校外，除星期日外，每天早去晚回出通勤。彦英那时住在校中三楼的学生寄宿舍，所以，他事实上还担负着对寄宿学生的“训育”的责任，以旧时的教育制度来说，他既然与学生同吃同住，所住的宿舍又是三间拆开的一间大统间，那就与那时也住在学校的另一位小学部的男教师必然要兼挑起义务的“舍监”的担子。他很爱护学生，和各班的大小寄宿学生都相处得很好。学生都很尊敬他，他照顾他们也很仔细，每夜他起夜回来，都打着电筒巡视一遍，给躯体伸在外面的学生把被子掖好。我有几次时间晚了回不去，也曾

在那里留宿过，因此知道这些情况。

彦英的工作比我繁重得多。因为虽然同样都是三个年级，但他所教的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比我所教的人数多，因而需要批改的作文本数也大约要比我多两三倍；况且初中的学生年龄也较小，平时打闹顽皮的纠纷也会多些。再加上他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有教务工作，这是我所没有的。因此平时除了打铃去上课外，那怕有一点空隙时间，也都背对着我坐在他的大办公桌上，几乎不抬起头来。那间校后门通道顶上的狭长小楼实际上是教务室和教员休息室，我的一张两屉书桌就紧挨着他的背后面墙而置，我们初高中六个年级只有两个必需看“周记”和与学生谈思想的国文教员，为了工作的方便，他便在排课程表时把我们的可以出现有空课的时间都排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那时，我们就都互不相关地各自找学生来谈话，谈话总会有间歇，那时，我便听得他和学生谈话的语调温和而恳切，不象我那样直来直去。我曾暗中佩服他的善于同离开儿童时期不远的少年们谈天，在与年龄较大的高中青年谈思想时，我也从他学会了采用温婉并且略带谈谐的商酌的语气。到了放学的时候，通学的学生都回去了，袁明吾经常让校工打几斤绍酒请我们在教务室喝酒，用花生米下酒。校长戴介民有时也端下几碟夫人手制的菜肴来给我们佐酒，他也有时陪我们喝几口，开玩笑说：

“我这个学校反正总是总也办不兴旺的，开学招进一批学生来，不要多久便都给你们给送走了。”

彦英先不大喝酒，有时坐在我们旁边和我们谈天，吃花

生米，后来也渐渐和我们同喝了。喝完酒以后，我们便一同出去到附近散步，观看霓虹灯下的从南京路到大世界一带的夜间景色：浓妆艳抹的穿着细高跟鞋的舞女们拎着玲巧的手提包进入灯火辉煌、管弦呕哑的舞场；在比较阴暗的角落里，常有那些“乡下人”模样的男子被一些雏妓拽住，象被蛛网粘着的昆虫那样正和捕捉住它的蜘蛛挣扎。这种散步，主要是要让大家特别是让彦英散一散口中的酒气，免得他睡在同学一起会有不好的影响。边走边谈，有时散步的时间很长，我回不去了，也就回到学校和彦英同睡。

白天他除了上课就伏在桌上写着，写着。我心里有些可怜他，以为他要批改的作文本太多，大约是给埋住了吧？有一次周末，我自己的作文和周记都处理完了，便走过去想拿几本来帮他批改一下（他教的有一班学生是我原来也教过的）。走去一看，原来他不是批改作文，而是摊开了稿纸，正在写什么文章。我伸手取过已经写成的一迭来看，原来写的是一篇小说，题目是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题下的署名赫然是“司徒宗”。

“啊哟，”我说：“原来你就是司徒宗啊！”

他抬起头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讪讪说：“我瞎写。”

这当然是他的谦逊之辞，我早读过他的一些发表过的小说，他的文笔是清丽的，而且层次分明，颇有隽永之味。但他说“瞎写”并非是谦逊之词，而是茅公对他的评语。他最初写了几篇小说的习作寄给茅公看，——我由于知道了他与孔

另境的亲兄弟的关系，自然也就知道了他与茅公的关系。茅公对他很严厉，一开始便说他简直是“瞎写”。茅公其实是爱护他的，对他的要求很严格，后来又详细地给他分析为什么这样写不好，应该怎样有全文的布局：什么应该先写，什么应该后写；什么应该多写、大写，什么应该少写或者竟不写。这样，经过好多次的重写，反复揣摩，渐渐地得到了一些门径，也得到了写作的兴趣和信心，因此，有空隙的时间他就常常思考一些新的篇章结构，思考到感觉已经成熟时便抽个空子写下来看看，如果自己都不满意，也就不把它示众。他是默默地独自进行着他的业余写作活动的，不象别的有些飞扬浮躁之气的作者那样。他几乎把自己的作品都当成姑娘们手中的针黹，一个一个地刺绣上各种花样，心中有时很喜欢它，但别人想要看看她们又害羞。

彦英这人真有些女孩子气，听到别人称赞他就有些害羞；但他也并不完全是谦逊，因为他总相信这些东西还能写得更好些。

建承中学的“周记”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制度，它容许并鼓励学生对教师充分展示自己的思想。在周记里有很丰富的内容，学生爱谈什么就谈什么，题目是他们自己找的。有时他们写自己所见到的社会见闻，有时他们写对学校和老师意见，什么都敢讲，其中充满了真挚的情愫。他们敢于对老师提出直接的批评，也敢于在周记中提出对学校和其他的老师的教学的意见。比如我就得到过学生在周记中对我的教学的批评，他批评我在有一堂课中讲什么是“灵魂”讲

得太详细了，几乎一堂课只讲了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不讲他们也是会懂得是虚妄的。至于在周记中所写到的社会情况，有时更能扩大教师的见闻，特别是让教师能看到这些年轻人的观点和思想情绪。看到这些周记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去找他们来交谈，那就使得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不会是无的放矢。

周记中学生也往往写到自己的家庭情况，这些情况有时不很好谈，但既然几次提到也不免作为一个问题来谈谈。彦英曾因一位女同学和他谈到被继母和嫂子的虐待的事而惹起过一些烦恼（这是由于他向我谈起我才知道的）。他说他想把这事写成一篇小说，不知后来写了没有。事情的经过简单说来是这样：那位女同学先是说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诸般苦楚——其实，她的家庭是个中产以上的家庭，——彦英找她来谈话，给她分析这些苦楚的所由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如何才能得到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她却继续在周记中渐渐表露了对彦英的爱慕之忧，逼得很紧。彦英对她谈了自己的生活勉强只能自理，没有能力成家，而且，不想连累人，不想结婚。这样，谈话的内容逐步地深入，就使得彦英自己也陷入了痛苦。好在，这位女同学后来辍了学或者转学他校了，但彦英还时时想起她，并未能完全无所怀念于心。

生活的苦闷，使他向往去解放区。他曾向袁明吾表示过这个意愿，袁明吾也表示浙东解放区需要大量的文教干部，欢迎他去。但后来袁明吾独自离开上海去了浙东，彦英却留